

廣州碑刻集

冼劍民 陳鴻鈞 編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碑刻集

陈剑民
陈鸿钧 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 (CIP) 数据

广州碑刻集/冼剑民, 陈鸿钧编.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61-3351-0

I. 广… II. ①冼… ②陈… III. 碑刻 - 汇编 - 广州市
IV. 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090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075 营销电话: (020)87557232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 41.875 插页: 12 字数: 1 054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1 000 册

定价: 86.00 元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神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庙内留下历代帝王祭祀南海神的碑刻，成为广州著名的碑林之地，南海神庙的碑刻见证了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庙内丰富的碑刻记录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盛荣景象，也反映了海神崇拜是广州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特征。

药洲遗址位于广州市教育路南方剧院侧畔，原为五代南汉王朝南
宫御苑所在地，这里湖泽宽广，园林别致，更有九曜石的奇观，宋代
以后成为名流雅士游乐之地，历代名人赋诗题名留下珍贵的石刻，
明清两代提学署驻建于此，周边书院林立，文人咏题刻石频增，
故药洲成为闹市中的碑林。





锦纶会馆位于广州下九路西来新街，建于清代雍正元年（1723）是广州至今唯一保留的丝织行业会馆。锦纶会馆的兴建与丝织行业的兴盛息息相关，这里保留了各朝重修会馆的碑记，是目前广州最丰富的会馆碑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城市工商业的繁荣。

隋徐智諫墓誌銘拓本

王林齋藏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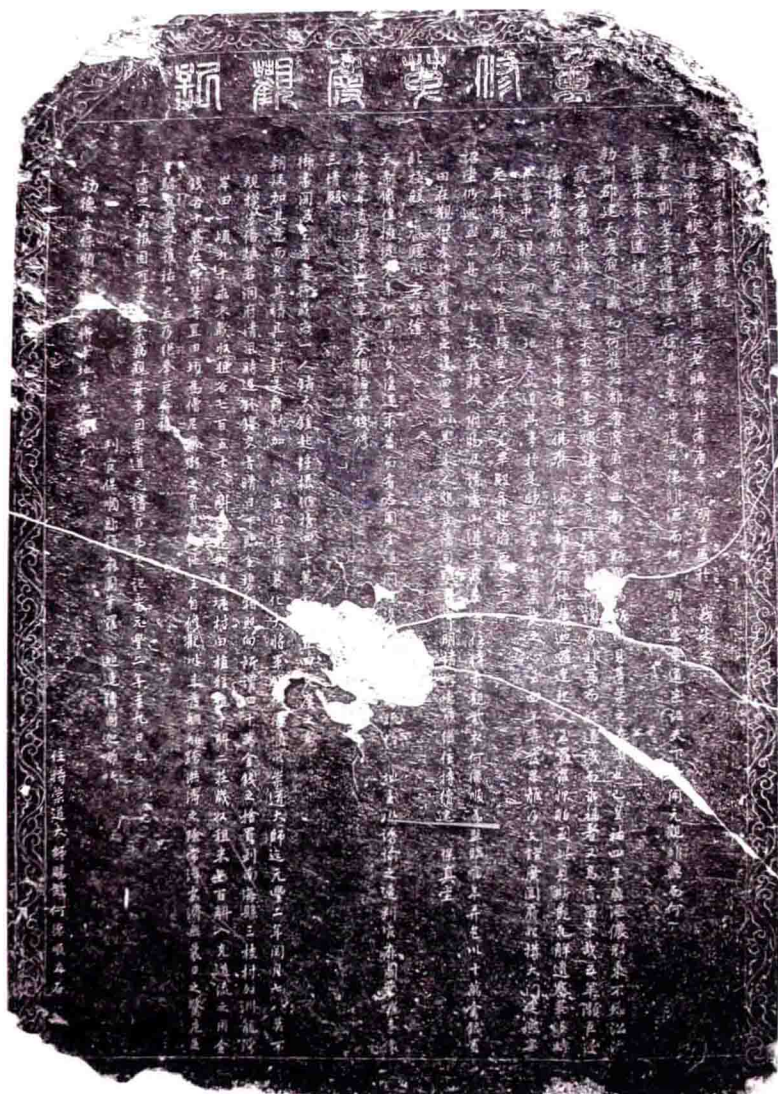


《大隋仪同三司连州刺使故徐使君墓志铭》是广州的“三大隋碑”之一，（其余二碑为《王夫人碑》、《刘猛进碑》）清末广州市出土，刻于隋大业八年（612年），此碑记连州刺使徐智諫的生平事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碑楷书典雅庄严，笔画苍劲有力，是广州不可多得的隋代书法名碑。图中拓片藏广东省博物馆。



《南海神庙广利王庙碑》由著名文学家韩愈撰文，著名书法家陈谏书丹，是广州现存最珍贵的唐碑，碑高二点四七米，宽一点一三米，二十四行，现存南海神庙头门西侧。碑中记述了广州刺史孔戣的德政和崇祀南海神的业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堪称岭南金石珍品。





元丰二年（1079年）《重修天庆观记》是广州重要的碑刻，现移置广州市博物馆碑廊。它记述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富商人赞助重修天庆观的事迹，反映了宋代广州与东南亚的友好往来，及道教对南海诸国的重大影响。



清故京卿朱九江先生祠堂之碑 門人三水梁如鑑題石

光緒七年辛巳十二月十九日九江朱先生卒越十有三年甲午門人懷其長而思有以妥其室也作祠於其鄉祀之先倡其議者梁君紹熙也贊成其決者梁君瑞也身雖其事者盧君慶雲譚君則賢也欽金助工者及門弟子暨小門生不一其人司出納始終其事而奏其成者先生族子麟元也病嬰進諸君子復奔走其間固人成事而已無能為援也祠基枕隄而峙江距朱氏祖祠數百武齊相聞望相見也祠制堂建四楹中設氣象鼎主雕飾不事無承乎華也堂下兩廊接大門步迤甚好無傷於恨也祠外三面餘地墾以垣右營一壯所左築一像亭石刻先生畫像在焉祠前小池廣與祠齊池外子隄相對如紫卜宅樓神得其兩矣鳩工於季春告成於仲冬凡費白金四千餘兩祠成回記其緣起俾後人得所覽觀至先生德行事業師表在人皆吾徒所當則而像之者也古人考堂作廟皆有詩曰提其義作詩十意以歌之願相與共勉焉詩曰

昔錢先生命世大儒惟孝風成三年倚廬弟兄師友祇徽同符人倫範範良楷模在先生通籍晉陽出竟季使解冰消瀚海父母喪陵政成半載澤派平河千秋長典墳先生建策登杜冠氣當道情知聽高不關投檄出疆賊踰河洛避前初服順志典墳先生里居 微命不起匪幽云高義在知止晚晉頭銜榮青 朝旨撫時感懷太息無已味先生著作身有書垂元病中悉付然如假年之業冀待居諸委心隨化還歸太室以先生有子小字三同父書能讀天錫其聰母憂哀跼乃卒以窮惟依嗣孫克紹家風以先生講學屏除門戶漢宋持平實用是主擬進聖賢通今博古懿矣典型春風時雨以高山仰止其風其韻告承而命貫耳如雷四德當乎世山堂開廟食則如易示將來其港祀白沙祠立斯感力漫泉崇祀彼先正道德在風派仰鄧經營既成妥慎有慶其嗟我同人禮祀來斯格遵道教無忝我師儒斯飲

宣統二年春二月乙亥朔越十有二日丙戌立石 高要梁君學訓字

《清故京卿朱先生祠堂碑》原存于南海九江朱次琦祠堂，碑为朱九江门人立，抗战期间此碑被盜，原碑不存，现拓片由朱九江后人朱杰民教授提供。此碑可考朱九江生平事迹及门人承传关系，成为岭南文化的丰碑。

广州碑刻多分布于祠堂之中，体现了宗族文化的特色。在编辑《广州碑刻集》中，编者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努力发掘新的碑刻材料，图为本书编者洗剑民（左，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陈鸿均（右，广州博物馆副研究员）在祠堂和古墓访碑。



编辑体例

一、本书搜集了广州市现行政区范围内的古代、近代碑刻。它包括两大部分：一类是前人已记录的碑记，它分散于地方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分布零散，要从广州文献中逐一辑出，集腋成裘；另一类是通过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把新发现的碑刻公之于众，它是多年来采访探寻的新成果。编者努力把广州历代碑刻作系统整理，其目的是为广州地方文史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

二、本书对所录碑文进行分类、标点、分段，并以简体字录出，目的是便利读者阅读和使用。对于有不同的记录的碑刻，均对原碑作了校勘，力求复以原貌。对碑刻加以说明的内容，均以编者按列出。收入碑文以类别分编，再按年代顺序排列。

三、本书所收的碑文其时间断限，以隋唐到清代为主，其中明清时期的碑记最多，民国时期的碑文也收集了部分重要的内容，但主体以古代碑刻为主。地域上除注重以广州、南海、番禺为中心外，也注意搜寻增城、从化、花都的碑刻，以求全面反映广州辖区的碑刻全貌。

四、原碑中凡有碑额、碑名者，一概照录；缺碑名者编者按碑文内容拟定；原缺纪年者由编者考定增补，无法考定者，年代不予列出。

五、碑文作者，根据碑文内容所记列出，凡碑文不列作者，或作者有疑问者，暂付阙如。

六、凡碑文漫漶不清，缺字，均以方形□代之；缺损字数过多，无法确定缺字数目的以括号（）标注说明。所缺文字，遇有资料可考证，补入方形□内，以区别此是编者考订文字，非原碑文字。

七、碑文中原有的错字，或古籍录碑上的错字，均照原文录出，以求保留原貌。少数由编者订正的文字均用括号（）标出。碑文原来的古体字、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通行的简化字，以便于识读。

八、碑刻存放地点按编者当时访查的地点记录；从文献引证的碑文，按原书所记地点记录；放置地点不详的碑刻，暂付阙如。

九、古代碑文是旧时代的产物，许多内容与当今的政治观点互相抵触，其诬蔑之词或歪曲事实之处，仍照原文录出，引用时敬请注意。

序 言

一、碑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碑刻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亮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大部分的文化成果都以书籍文献流传后世，然而随着年代久远，许多帛书、残简、古籍都腐朽残破而灰飞烟灭了，而碑刻文献却因贞石不朽而永垂久远。碑刻的内容丰富多彩，往往取材于历史大事，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史，不能不借助于碑刻材料。它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同时也是原始文物，故深为文化工作者所珍视。

自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等辑录金石文字的专著问世，标志着金石学已经出现；但碑学的真正崛起是在清代中叶，它对中国文化带来的冲击，真叫人始料不及。清代的学术成就在考据学，由于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碑学晋升为专门的学问，成为考据学的结晶体之一。碑学的崛起发掘了大批前所未见的石刻档案，而新材料的出现正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条件。当时的著名学者无不有“金石癖”，他们纷纷走出书斋访碑，凭着碑刻所提供的证据，攻破学术上的各种难题。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把碑刻广泛用于文史考证，金石学家吴大澂把碑刻文字用于音训考古，纠正史书的种种谬误。中国学术在碑学的折射下，绽放出灿烂的光辉，产生了大批搜集碑刻的专著。像叶昌炽的《语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碑刻的发展、分类和内容，奠定了碑学的基础理论，成为中国碑学的开山之作。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环宇访碑录》，均于遍访国内名碑后撰

写，成为资料丰富、影响甚大的碑学巨著。当时从事教育的官员也十分重视对地方碑记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乾隆年间广东学政翁方纲编著《粤东金石略》，是广东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带动了粤省的碑学研究。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时已编《山左金石志》和《两浙金石志》。道光年间阮元督粤，编修《广东通志》，立《金石略》专章，汇集了一批金石名家进行校勘和考证，编撰出广东最完备的碑刻集。清一代，广东金石学家为数不少，其中以吴荣光撰写的《筠清馆金石录》、梁廷枏的《金石称例》、吴兰修的《南汉金石志》、彭泰来的《高要金石略》、黄培芳的《端州金石略》、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为著名。

碑学的崛起对中国史学有更大的影响，以碑证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因为碑刻可补史书之不足和纠正史书上的错漏。写人物志，未见其人的墓志铭不敢轻作论断，因为墓志铭，提供了盖棺定论的素材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平事迹。编写方志采用碑刻则更为广泛，因为历来人们都力求把重要的经历镌之贞石，以示不朽，所以碑刻所记，往往是历史中的大事。故编史以碑刻为借鉴，成为史学的必循途径。以广东的地方志为例，康熙《广州府志》已把碑刻列入艺文志中，在总论中首先把重要的碑刻目录列出。重要的碑记作为艺文的内容一一录载。乾隆以后的地方志，开设《金石略》的专篇已较普遍。阮元收编《广东通志》，设立《金石略》的专章，作了规范。他不单把省内重要碑刻一一列出，还对各碑作出详尽的考证，纠正了前人好些认识上的错误。在道光《广东通志》的影响下，同治《广州府志》也列有《金石略》的专编，搜罗了广州府的重要碑刻。同治《番禺县志》和宣统《番禺县续志》对碑刻更为重视，碑刻的材料几乎占总内容的四分之一，除《金石志》外，《建置志》因涉及碑刻较多，也大量采用碑刻作补充内容，其他篇目如能以碑刻证史，都一一加以利用。

人们对碑刻的重视改变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路向。对着众多的碑刻，清代人的审美意识有了更高的升华，他们惊讶地发现毛笔字经过镌刻入石，要比原作更为美观，充满了金石的情趣，经过风化的碑刻更是古意盎然，这是帖学所无法表现的意蕴。看腻了二王法帖，顿时觉得北碑有着如此雄强古朴的气象，这正是传统帖学所缺少的内涵，于是人们一反传统帖学的守旧和因袭，开始了中国书法的革新，如阮元提出了北碑南帖论，康有为进而提出遵碑的学说，他的《广艺舟双楫》则是碑学的集大成著作，对北碑的各种风格和特点一一归纳。从此中国书坛关注着碑学，拓展出书学的新天地。熔冶碑帖，南北风格的融合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新潮流。

正是碑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才引起了我们对广州碑刻的关注。广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对外贸易港市，由于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留下了无数历史丰碑。历代的残碑刻石，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古广州的历史画卷。于是搜集和整理广州碑刻便成为广州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广州碑刻的分布与种类

旧广州的碑刻异常丰富，据《广州市城坊志》所记大北庙是一个碑林之地。“北庙在大北门直街，规模雄峻，香火至盛，廊坊碑碣林立，皆宋元刊刻，有至圣先师暨老子、如来诸像”。大北庙是李成栋之乱毁于大火的。康熙二十四年，“驻防参院领高登始修复之，命人于瓦砖中搜得三教圣像，短碣二十余，其完好者，咸竖之壁，剝缺者或为柱础或作阶级又不知凡几矣”。（《广州市城坊志》卷二，《大北庙》）大北庙的损毁是广州碑刻文化的一场浩劫，因为大北庙保留的宋元碑刻最多，宋元是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蕃客云聚广州，与之有关的碑刻定然不少。北庙碑刻的损毁对广州研究不能不是一种

遗憾。

药洲是广州市内又一古石刻云集之处，今天广州市西湖路南方戏院的庭院尚留下药洲和九曜石的古迹。这里原是南汉王朝南宫御院的遗址。南汉时刘龚开凿了仙湖，因在瓮城之西，亦称西湖，其水接白云山的文溪水，东连沙澳，与药洲相连，长达百余丈。药洲之地，曾为南汉方士的炼丹药处，故称药洲，中有九曜石。据《广东新语》记：“九曜石，在药洲旁，南汉主刘龚使罪人移自太湖，灵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余，嵌岩崢兀，翠洞玲珑，望之若崩云，既堕复屹，上多宋人石刻。”宋代这里依旧是广阔的湖泽，并在仙湖建起白莲池，景象蔚为大观。游人雅士多泛舟游玩，刻石留念。著名书法家米芾在九曜石中留下了“药洲”二字，还有题诗。名士的题刻日积月累，故成石刻景观。明代以来西湖日渐淤积，已非昔日的景观。但尚存“药洲春晓”胜景，为羊城八景之一。清代西湖已成陆地，但乾隆年间尚有开阔之景。故广东学政翁方纲能在药洲拓录了许多石刻，并留下多种题记。其考证文篇附于《粤东金石略》。另外清人周中孚撰有《九曜石刻录》。今天九曜石园仅有400多平方米，剩下碑刻数十方，遗石五座，昔日药洲的题字已大部分被掩盖，幸得清代人的努力，才使九曜石的石刻文字得以保存下来。

南海神庙有广州碑刻中最富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碑林，也成为中国碑刻的精华所在。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该庙早在隋朝已建起，唐宋以来，由于广州对外贸易的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朝皇帝对南海神的加封不断升级。四海之神以南海为大，每年皇帝派出钦差大臣前来南海神庙拜祭，每次御祭南海神的活动，往往都刻石留记。于是随着历史文化的积淀，碑刻与日俱增，至今留存的唐代韩愈《南海神广利王碑》和宋代《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碑》都成为海外交通史上的珍贵文物。南海神庙的庙会也成广州的盛事，每年波罗诞盛况空前，这里留